

五大
書學

陈平原 著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大学五书 |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 陈平原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7

(大学五书)

ISBN 978-7-301-26025-8

I. ①抗… II. ①陈… III. ①高等学校—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8995号

- | | |
|-------|--|
| 书 名 |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
| 著作责任者 | 陈平原 著 |
| 责任编辑 | 于铁红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025-8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pup@pup.cn |
| 电 话 |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0112 |
| 印 刷 者 |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00千字 |
| |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5.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大学五书”小引	/ 001
绪言：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	/ 003
此情可待成追忆	/ 019
——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	
一、炸不垮的中国大学	/ 019
二、1941 年的统计	/ 027
三、不该被埋没的文本	/ 035
四、笔落如何“惊风雨”	/ 049
五、“奇迹”该怎样讲述	/ 067
永远的“笳吹弦诵”	/ 111
——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	
一、战火摧不垮中国大学	/ 112
二、“光荣”不仅属于西南联大	/ 122
三、必胜信念、学术关怀以及师生情谊	/ 129
四、以本科教学为中心	/ 145
五、“人和”的另一面	/ 154
六、“应叫青史有专篇”	/ 165

岂止诗句记飘蓬	/ 183
---------	-------

——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

一、漂泊西南多唱酬	/ 188
二、百一篇成聊自遣	/ 198
三、诗史更愧无君才	/ 210
四、还将孤愤托长吟	/ 218

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	/ 237
-----------	-------

——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

一、从“宏大叙事”到“私人记忆”	/ 237
二、师生之情与同窗之谊	/ 241
三、“新文学”教学之披荆斩棘	/ 246
四、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	/ 253
五、政治与学术的纠葛	/ 258
六、物质与精神之张力	/ 263

参考书目	/ 275
------	-------

后记	/ 287
----	-------

“大学五书”小引

陈平原

不提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如何邂逅晚清及五四的大学教育，就从1996年春夏编《北大旧事》说起，二十年间，我在自家专业之外，持续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竟然成了半个“大学研究”专家。

我之谈论大学问题，纵横文学与教育，兼及历史与现实，包容论著与时评，如此思路与笔墨，说好听是“别有幽怀”，说不好听则是“不够专业”。好在我不靠这些文章评职称，故不太在乎学院派的态度。

作为业余教育史家的我，多年前曾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

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这也是我不避讥讽，时常“野叟献曝”，且长枪短棒一起上的缘故。

正因不是学术专著，没有统一规划，先后刊行的各书，呈犬牙交错状态。乘《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出版之际，将我此前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四册有关大学的书籍重新编排，作为“大学五书”推出。其中《老北大的故事》大致稳定，《读书的“风景”》只删不增，调整幅度较大的是《大学何为》和《大学有精神》。

很多年前，我在《北大精神及其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的“后记”中称：“这是一个能够调动研究者的激情与想象力、具备许多学术生长点的好题目，即便山路崎岖，前景也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尝试。”今天依然故我，只要机缘成熟，还会深度介入教育话题。

因此，“大学五书”只是阶段性成果，但愿日后还有更精彩的表现。

2015年5月1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绪言：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

“连天烽火”与“遍地弦歌”，这本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景，而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交织成撼人心魄的乐章。我曾不止一次推荐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中的一幅照片^[1]：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我说：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

[1]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吴昌杰译：《阅读史》，第370—3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1]。后来，我终于找到一幅可与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的合影（图1）——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体时间及地点，以便将其作为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我提及这幅照片：“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2]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历朝历代，凡狼烟四起时，最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便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及学校；只有当战乱平息，统治者才有心思在满目疮

[1] 参见陈平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文汇报》2005年12月25日；《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光明日报》2009年8月20日。

[2] 参见《陈平原：寻找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俞熙娜整理），《钱江晚报》2007年12月18日第14、15版。

痕的废墟上重建教育。借用建安八年（203）曹操所下《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中国历史上几次影响重大的衣冠南渡，就其实际效果而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转移，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学校的壮举。抗战中中国大学之所以没被炸垮，还能弦歌不辍，乃中央政府、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未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那是因为，美国远在天边，不太受战火影响；英国虽被轰炸，国土未被入侵；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只是因各大学在外流徙时间不长（以莫斯科大学为例，1941年10月迁离危城，1943年春胜利回归），没能像西南联大等中国大学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谈及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

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而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等，也算是“别有幽怀”。

我曾提及：“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大体上都是实践这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1]因专业背景的关系，我谈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大学，最为拿手当行；其次便是对于当下中国教育改革大潮的评论——思考不见得周

[1] 陈平原：《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代自叙》，《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全，但洞见还是有的。至于中间这一大块，我之选择“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是希望兼及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

说起来，关于“战争中的大学”这个题目，我酝酿了好长时间，只是多为演说或短论，不太能端上台面，只好任其散落各处。

记得我最早谈论这个问题，是1997年1月为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刊《中古文学史论》所撰跋语，其中提及：“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1]对于西南联大乃至所有内迁大学的教授及学生来说，“南渡”既是学术对象，也是文化氛围，更是精神传统——时至今日，我仍坚持这一发现。另外，谈内迁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既充分肯定其业绩，也不盲目拔高，理解各专业领域所受战争的影响不同，体贴学者们是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如此观察与评论，兼及政治史、学术史与教育史，使得我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可与此前此后的大学史论述血脉相连。

三年后，我发表题为《过去的大学》的短文，谈西南

[1] 参见王瑶著《中古文学史论》，第440—4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联大极为严苛的图书借阅制度，以及教授会在动荡年代所发挥的作用。前者是为了渲染大学的艰难处境，后者则凸显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1]。但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是推介六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而对我本人来说，从中得到的最大好处是，熟悉西南联大这些琐琐碎碎的档案资料，必要时可以手到擒来。

又过了两年，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吴宏聪与西南联大的故事——吴宏聪先生的〈向母校告别〉及相关照片》^[2]，文章引述了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期间的指导教授吴宏聪先生的来信及文章，讨论西南联大的学术品格。吴先生乃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此前几年曾赠我精心保存的离开昆明前全系师生的合影，这回又专门撰文回忆那天拍照的情景，实在难得。此拍摄于1946年5月3日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以及吴先生所描述的拍照前后的故事，是我每回演讲中国大学内迁历史时都要演示的。

[1] 参见陈平原《过去的大学》，《新民晚报》2000年7月16日。

[2] 参见陈平原《吴宏聪与西南联大的故事——吴宏聪先生的〈向母校告别〉及相关照片》，《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0日。

可我真正认真对待此话题，是从2007年开始。那一年，因参加宗璞先生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座谈会，我发表《小说家眼中的西南联大》，谈及借文学作品了解西南联大，最值得推荐的是鹿桥的长篇小说《未央歌》，汪曾祺的系列散文（如《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翠湖心影》等），以及宗璞的《野葫芦引》。带有总论性质的，是以下这段话：“鹿桥的小说侧重‘青春想象’，汪曾祺的散文则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为颇具‘史家意识’，其系列长篇立意高远，气魄宏大。”^[1]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那时仅出版了前两卷（《南渡记》，1988年；《东藏记》，2001年），我预言，倘若计划中的《西征记》《北归记》能顺利完成，并保持前两卷的水准，那么，宗璞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将大为提升，其在文学史上的既定评价也势必改观。

约略与此同时，中山大学为中文系老系主任、西南联大校友吴宏聪先生做九十大寿，我提前撰写了长文《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请《21世纪经济报道》及时刊出，且送到了祝寿会场。此文主要谈论

[1] 陈平原：《小说家眼中的西南联大》，《新京报》2007年11月7日，以及《群言》2007年12期。

吴宏聪、王瑶、季镇淮是如何饱含深情地追忆他们各自的导师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并借此呈现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想象的^[1]。

那年的12月15日，我在浙江人文大讲堂做题为《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的意义》的专题演讲，现场效果很好，《钱江晚报》记者据录音整理，以《陈平原：寻找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为题，初刊《钱江晚报》2007年12月18日第14、15版。虽然日后收入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大学有精神》时，我改回了原来的题目，但我承认，“寻找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确实是那次演讲“压在纸背的心情”。此报道摘录了我演讲的四个片段，分别是“留下了‘读书种子’”“联大人胜在‘心态’”“全力培养本科生”以及“今天我不想谈校长”，另外一半篇幅则留给了现场问答，因此显得很有现实针对性。

其实，那年4月，春暖花开时节，我还在云南大学做了题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关于大学生活的追怀与叙述》的专题演说，涉及西南联大处，我引证了冯友兰的自述、吴宓的日记、汪曾祺的散文、冯钟璞（宗璞）的小说，还

[1] 陈平原：《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1月12日。

有四位老学生的回忆录——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华》以及何兆武的《上学记》等。只不过这篇初刊《学园》创刊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演讲稿，着重点在如何追怀大学生活，兼及昆明的西南联大、香港的新亚书院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现场效果虽不错，但体例驳杂，我不满意，故从未收入自家集子。

第二年深秋，参加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中译本出版座谈会，迫使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那就是怎么看待抗战中沦陷区的政治及文化生态，以及如何谈论类似周作人这样的“落水文人”。在《燕山柳色太凄迷》一文结尾处，我谈及读《北京苦住庵记》的感想：“对于生活在太平岁月的读书人来说，面对乱世中的‘文人落水’，首先是哀矜勿喜，千万不要有道德优越感。其次，不管是讥讽/批判，还是理解/同情，谈论此类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及人物，分寸感很重要，即所谓‘过犹不及’是也。作为史家，必须坚守自家立场，既不高自标榜，也不随风摇荡，更不能一味追求文章之‘酣畅淋漓’。有时候，论者之所以小心翼翼、左顾右盼，文章之所以欲言又止、曲折回环，不是缺乏定见，

而是希望尽可能地体贴对象。”^[1] 如此有感而发，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关注“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以及沦陷区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既坚守自家立场，又保持必要的张力，这种论述姿态，使得我在辨析教授们离开北平时的“毅然”与“茫然”，以及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处境之间的痛苦挣扎，有较为真切的感受与体悟。

我之谈论抗战中的中国大学，至此方才正式上路。此前乃随意点染，算不上专业研究，故不收入本书；唯一的例外是《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因可见最初的研究思路及感怀，故特意保留。本书共四章，各文的大致思路如下：

第一章《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初刊《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2期）酝酿很早，定稿却在最后。讲述抗战中中国大学内迁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后回忆与学者发掘固然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事人当年的文字，看他们如何在惊魂未定之际回首往事，制造传说，总结经验，畅想未来——那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精神。此文借1941年《教育杂志》

[1] 陈平原：《燕山柳色太凄迷——读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读书》2008年12期。